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初

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杜晓勤 著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東方出版社

初

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杜晓勤 著

東方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责任编辑:王 粤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杜晓勤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7

(日晷文库丛书/吴先宁主编)

ISBN 7-5060-0908-0

I. 初...

II. 杜...

III. 唐诗-诗歌史-文学研究

IV. I207.209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CHU SHENG TANG SHIGE DE WENHUA CHANSHI

杜 晓 勤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45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060-0908-0/G·160 定价:19.00元

总 序

东方出版社与吴先宁同志共同合作,经周密考虑与多方联系,约集近数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组织出版一套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著作,第一批共十二种,起名为《日晷文库》。我觉得这一丛书的名称很有特色,它不但是比喻中华古典文学还如日行天,灿烂辉煌,照耀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祖国大地,而且象征我们这一代年轻的研究群体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全身心地投入这一蓬勃向上的精神领域,努力开创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学术天地。

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期。这是本世纪前80年所未曾有过的。所谓转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的一大跃进。前几年在学术界曾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可惜口号虽然提出,讨论并未具体展开。但我们的研究实践却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注意史的发展线索,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作家,而是连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时段。这就不是作家评论的程序汇编,而是文学群体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作家之间的关系(如新老作家的交替,文人集团的友谊与冲突),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消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创作风格的变化,不同文体的代兴。这之中,

群体与时段的研究,是这些年来最出色的成绩。有谁在这方面下了工夫,他的著作就能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即使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是孤立的人,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流动着的文学环境,有一个层次不等的群体,即使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也是属于同时同地的艺术家族的。

这种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特别是在年轻研究者中,已经形成一种冲力,那就是要从过去占很大优势的局部、个体研究中挣脱出来,对文学的长时期发展阶段作出整体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表明研究者的力度与深度,反映这一代学人所特有的对文学命运的关切与忧思。

转型期的另一表现,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古代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与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关系,已被人们逐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正如19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当然,我们这样做,不仅要考虑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更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其特色。它不是使文学隐没,而应是使文学作为主体更加突出。

这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真正有所进展的话,那么,这种文化意识的观念及其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是最可值得称道的成就。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进行一些探讨,那么这个文化意识问题就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新的课题。

我觉得,从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新格局和新思路来看这套丛书,可以说现在这十二种著作正是从总体上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与年轻一代的创新气度。这十二种书,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开始,一直至明清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是从思潮、流派、群体出发,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进行清理,重在清理事实,而不简单地品评高下,不单纯立足于点的深化,而在于线的连续;与此同时,又善于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恰当的中介环节,使我们接触到那一时代、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自 80 年代中期起,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为数不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培养出来和成长起来,这已构成我们今天古典文学界的一代研究者,他们无论从治学道路、理论观念,以及精神气质、学术兴趣等方面,都表现出与 80 年代以前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已日益显露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品格。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对传统研究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对现状的研究,而现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这十余年来这一研究生群体的研究,研究他们和他们的著作,与研究古典作品本身有同样的意义,同样的价值。特别是这 90 年代以来的一批博士研究生,他们之中不少人更注意广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和观念,而另一方面又努力对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文学史料作沉潜的研索,这种勤奋的实证训练是足以支撑他们作大幅度的理论探索的。当然,在这之中,需要对现实社会中的市场冲激与贫富差距有理性认识,要有左思《咏史》诗中所说的“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的心理准备。我想,这十二种著作产生的本身,就足以表明我们这一代年轻学人为学术而奉献的文化素质。

11192111

这套丛书的总序应由丛书主编吴先宁同志来写的，我推辞再三，但吴先宁同志与东方出版社还是希望我借此谈谈对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与前景的看法。吴先宁同志是曹道衡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编委中傅刚同志的博士导师也是曹道衡先生，而曹先生则是我的学术至交。编委中的钱志熙同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我都分别在杭大和北大参预评议。过常宝同志关于楚辞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我应聂石樵先生之邀到北师大去主持答辩的。黄仕忠同志虽在中山大学，但与我早有文字交往。我很感谢他，我在1962年所考的关于《琵琶记》作者高则诚卒于明朝立国之前一说（《文史》第一辑《高明的卒年》），得到他的赞同并给予进一步的补充论证。因此可以说，我有缘与这几位年轻博士生有学术交情，因此也就不自量力，为这套将能受到读书界注意和欢迎的《日晷文库》撰写这篇小序，谨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傅璇琮

1997年3月

目 录

绪 论	1
-----	---

通论 初盛唐诗歌文化精神溯源

第一章 渊源之一:士庶力量之消长及诗人心态之变化	9
一 士族意识为主的齐梁时期	9
二 北朝大族的庶族化与诗中的济世意识	11
三 士庶力量对比开始转化的隋唐之际	13
四 龙朔年间庶族寒士的崛起及其人格缺陷	16
五 武后朝初期中下层寒士的人格自觉和艺术反拨	19
六 武周、中宗朝寒士阶层的全面兴起与其人格发展	24
七 开元天宝间庶族寒士人格的完善与个性的自由发挥	28
第二章 渊源之二:地域文化之整合及盛唐之音的形成	32
一 南北朝后期三大地域文化的并存与交互影响	32
二 隋代三大地域文化的交汇与诗风之变	37
三 因隋之旧的唐初文化格局与诗坛风尚	41
四 武后之擢拔微族与各地域寒士之并进	45
五 开元天宝中各地域文化之整合与盛唐文化精神	51

正论 南北朝至盛唐间文化转型与诗歌艺术之演进

第三章 南朝诗歌艺术精神与士族文化	60
一 南朝士族政治弊	60
二 “寒人柄用”与南朝寒人的文化质素	65
三 南朝诗人多士族	69
四 齐梁诗歌的文化内蕴	75
五 入北诗人对南朝文化的反思及其诗风之变	91
第四章 合而未融的隋代诗坛与南北文化的交汇	99
一 隋初文化格局及隋高祖的文化政策	99
二 鼎足而三的诗人群体及其艺术精神	106
三 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30
第五章 唐初宫廷诗风与士风之关系	148
一 唐太宗对南朝文化艺术之态度	149
二 关陇诗人学南之风	154
三 魏徵等人诗歌革新失败原因	160
第六章 王绩诗歌与河汾文化精神	166
一 山东士子经世致用的文化传习	166
二 王绩的“隐”与“仕”	174
三 王绩与魏晋风度	179
四 王绩诗歌艺术精神	185
第七章 龙朔初载诗风新变与新进文士的人格缺陷	195
一 龙朔初载“文场变体”辨析	195
二 龙朔诗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人格特征	199
三 龙朔新变诗风的艺术精神	204

四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人文内涵	208
第八章	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	213
一	初唐四杰与北方儒学之关系	213
二	初唐四杰与阴阳象数派易学、道家思想之关系	218
三	儒家诗教对四杰诗文创作之影响	221
四	“盛衰之变”主题与“天道盈虚消息”说	225
第九章	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	231
一	家学传统对陈子昂人格精神之影响	231
二	陈子昂与武周政权之关系	236
三	陈子昂近体诗的艺术精神	241
四	陈子昂感遇诗中的家庭文化因子	244
第十章	武后、中宗朝宫廷诗风对盛唐诗歌的先导意义	249
一	武后宫廷诗人文化的心态之变	249
二	武后、中宗宫廷诗中的盛世情怀	254
三	武后、中宗朝士子的人格反思与盛唐理想人格	259
第十一章	开元前期诗风之因革	266
一	宫廷诗风发展的迟缓性	267
二	“吏治与文学之争”对开元前期诗歌发展之影响	280
三	张说等贬谪诗人的艺术新变	291
四	盛唐诗人文化心态的形成	300
后 记		310
主要参考书目		312

绪 论

初盛唐诗歌一直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对盛唐诗歌的文化特质或盛唐文化精神的探讨,也是硕果累累、新见迭出。但人们在研究初盛唐诗歌艺术进程时,多着眼于初盛唐诗人对南北朝诗歌的批评和革新,很少有人强调南北朝诗歌与初盛唐诗歌之间的传承关系和内在关联。本人认为,无论是从诗歌的情感质素还是艺术形式上看,初盛唐诗歌都不完全是对南北朝诗歌的一种反拨,而是递嬗渐进中的继承和发展。而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的嬗变,又基本上与6世纪初至8世纪中叶发生的文化转型相伴而行。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认识盛唐诗歌的文化精神,首先必须结合南北朝文化向盛唐文化转变的轨迹,将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过程中受文化转型影响产生的诗风之变揭示出来。这就决定了本书以历时性描述为主的研究特色。

因为文化转型本身就是一个全方位、多层面、递进式的过程,而其对诗歌艺术发展之影响又有中介、局限的,所以要真正恰如其分地、全面真切地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又近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本书“通论篇”先抽绎出“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这两条中近古文化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线索,对初盛唐诗歌所走过的文化历程进行回顾,从而揭示出盛唐诗歌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历史渊源。

在探讨“士庶之变”对诗风影响时,本书注意到诗人心态是这

种影响的中介。“士庶之变”直接促使诗人的文化心态发生变化,而诗人的文化心态又大多能直接、间接地体现在其诗歌作品中。相对而言,诗人心态与作者在诗歌中表露出的精神境界、人生抱负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对诗歌中情感基调的影响要稍间接些,因为决定诗歌情感基调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诗人理想与现实之关系,以及诗人对这种关系的认识程度。至于诗人心态之变,对语言、声律、意象等艺术因素之影响,则更不明显了,如果有,也是以审美趣味为中介的。

对于“地域文化”这个概念,本书未取学界常说的“南北文化”之义,而是在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的启发下,拈出“江左文化”、“关陇文化”、“山东文化”这三个概念。因为这三大地域不能简单地分成南北,关陇文化、山东文化对江左士族文化之态度是不同的,在隋唐之际及初唐,三大地域文化彼此交汇、冲突、融合的过程也异常复杂。为了便于论述,本书先从此一阶段各地域人士在政坛、诗坛之地位着手,勾划出此一时期的文化格局,再揭示出各地域文化受另两种地域文化影响后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本地域士人心态、诗歌创作之影响。在论述地域文化对诗风影响时,本书同样注意到其层次性、局限性。一般说来,各地域士子的性格特点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当地诗人的人生趣尚、仕进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吟咏的主题、题材。而各地域艺术审美观又会影响到当地的诗歌创作风尚。而且各地的自然山川、气候特点等地理因素,也会对各地诗歌中所描绘之物象、意境产生一定影响。另外,如各地方言,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当地诗人对诗歌音韵美的体悟。当然,本书在具体论述中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有主有次、各有侧重。

考虑到中近古之交的文化转型对诗歌艺术之影响也是具体而微的,绝非“士庶力量之消长”和“地域文化之整合”所能概括,更由于诗歌史、文化史本身是极其丰富、生动、复杂的,为了更全面、细

致地考察南北朝至盛唐间诗歌艺术转型与文化转型之关系,把握住其中的影响机制,以及种种历史现实因素。本文下篇从史的角度,以一个时期或一个诗人群体,甚至一个重要作家为观照点,以诗人心态为中介,多层次、多角度而又各有侧重地探究其诗歌创作受当时文化精神之影响。

在研究各个时期诗人心态之变时,本文认识到导致诗人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很多,就每个具体诗人来考察,其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如果从某一个历史阶段诗人群体心态发展的角度而言,又往往是由一些重大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为此,学术界也曾从经济基础的转换、社会制度的改变、仕进方式的变化等方面,探讨了齐梁到盛唐间诗人心态演变的部分原因;本文则认为,政局的变动、文士地位的上升、文化思潮的变迁,也是导致诗人心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首先,我们发现,促使诗人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局的变动。自古以来,士人就与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齐梁士族诗人虽然大多讳言功名、罕关庶务,似乎疏远了政治,但这种表现上的冷漠,又是以其政治特权、仕途上的垄断性为前提的。而且,一旦政局发生变化,这些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他们的心态也就不得不变了。如梁末战乱迫使一部分江南士族沦落北土,失去了昔日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他们也就不再讳言功名了,而是开始表露出一些复振宗国、建功立业的想法。在隋末战乱中,江南士族要想挽救其政治、经济上的颓势,就不得不与关陇军事豪强携手,共同打天下,再建新的政治秩序。所以江南士族萧瑀、陈叔达等人也都直接参加了代隋建唐的政治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江南士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到高宗永徽年间,围绕着宫廷中的“立后”事件;享有既得利益的关陇贵族、江南士族与新进微族寒士针锋相对,为争夺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激烈政争。尽管微族寒士在政争中暴露

出了某些人格缺陷,但另一方面又充分说明他们已不甘心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急于分享政治、经济利益,显示出空前的政治热情。而同时,关陇贵族和江南旧族亦必须为保住其既得利益而挣扎一番。武后掌权之后,大量擢拔寒士,更激起了庶族寒士的仕进热情。士族在遭打击之后,已无太多的政治特权,他们也被迫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昔日曾经有过的罕关庶务、唯务玄虚的心态至此渐渐成为历史陈迹。

其次,文士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是导致诗人人生理想发生变化的历史前提。在齐梁陈隋及唐初,擅长吟咏、以文章进身的文士虽然待遇优渥,然政治地位并不太高。南朝士族诗人只有沈约等极少数人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其余的文章之士大多为文学弄臣,而宫廷诗人如庾信、徐陵、江总等人亦乐而为之。到唐初,太宗开文学馆后,虞世南、孔绍安、褚亮、李百药等文章之士的政治地位亦不显赫,仅备太宗文学顾问而已。所以一直到四杰,中下层文士的人生理想也还是希望以文章进身,在宫廷尽侍宴游从、润饰鸿业之职事。然而,从高宗、武后朝开始,由于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推行,文士担任重臣人数的增加,文章之士在朝廷中的作用就不再局限于修书、吟咏了;他们也逐渐进入到中书省,担任草诏拟令的机要任务,有的还位居宰衡,直接参决政事。由于文士政治地位的显著上升,中下层寒士如陈子昂、卢藏用、吴半千等,也就产生了以文章登用,草诏拟令、纵论军国大事的人生理想。在武后及玄宗朝,由于边境战争频仍,文臣出征也屡见不鲜了。而且狄仁杰、张说等人更是出将入相,屡建边功,这就使得当时的中下层文士也改变了人生理想,他们大多希望进入朝廷后能出将入相,做伊尹、姜尚一流人物,实现安邦定国之志。

再次,各阶段文化思潮的嬗变,也影响到诗人的人生抱负、人格精神。魏晋以后,纯学术性的儒学虽然未尝中断,而以经国济世

或利禄为目的的儒学人生精神则普遍失坠。齐梁时期,玄学与佛学结合,文士们更是以玄虚为务,风流相尚,罕关政事。周隋时期,由于北方儒学尚保存着汉学重质实、尚功用的特点,出身北方的诗人如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人受此影响,则表现出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人生态度。唐初南北学风合而未融,诗人心态亦大致呈务玄虚与尚质实并存的局面。到高宗、武周时期,儒学衰微、法网严峻,又使得贞观中文士尚存的忠直、骨鲠的人格精神为宫廷诗人阿谀献媚、卑弱无骨的人格特征所代替。朝臣中忠直如狄仁杰、魏元忠等则是凤毛麟角,殊为难得。只是到玄宗即位重新张扬儒学之后,文士们才又普遍崇尚骨鲠、刚直的人格风范。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诗人心态的变化与诗歌风格转变也有不同步的现象。这种不同步现象主要表现为诗人心态发生了变化了,诗歌风格并未立即随之改变,这主要是由诗歌创作观念的滞后造成的。如唐初太宗和一些重臣都曾戎马倥偬、屡建功勋,其心态与齐梁士族诗人自不可同日而语;然他们的诗歌却沿陈隋遗风而未能大变,即使是一些言志述怀诗也并无多少刚健之气,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创作观念、诗歌审美趣味呈滞后状态。再如龙朔诗人,虽然其文化心态与齐梁士族甚至与唐初士族不相侔,但是由于其人格尚有许多缺陷,更由于其入仕之后颇安于富贵,以豪侈相尚,诗歌创作方面也部分沿袭了南朝诗歌重艺术形式轻情志表达的风尚,遂遭到后起寒士诗人们的批评了。

然而,不管齐梁至盛唐间诗人心态的发展历程是多么漫长、多么曲折,也不管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之关系多么复杂,盛唐风骨的形成、盛唐之音的出现,终究是和这二百多年间一代代诗人们不懈的心灵求索分不开的。

通论 初盛唐诗歌文化精神溯源

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叙》云：“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这句话被人们广泛征引，用来说明盛唐之音的形成；学术界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也赋予了这句话比较具体、深刻的文学史意义。^①而且，人们对盛唐之音的艺术特质、时代精神也已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大多认为盛唐诗歌风骨遒劲、气韵浑雄、兴象玲珑，充分表现了诗人们积极乐观的进取意识，高昂明朗的盛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但是，对盛唐诗歌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这些文化精神的渊源和发展过程，学术界则研究得不够。本文认为，盛唐诗歌确实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辉煌顶峰，盛唐文化也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页，然而盛唐毕竟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所以研究盛唐诗歌以及盛唐文化本身诚然重要，但是研究初盛唐诗歌所走过的艺术历程，以及盛唐诗歌之所以出现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机缘，更具意义和启示。而且，对于隋唐之际的文化是如何逐步由精致而纤弱的士族文化转变成雄浑、刚健的寒士文化，如何由各具特质、互相冲突的三大地域文化整合为和谐、浑成的盛唐文化，学界也无较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下面拟从士

① 如葛晓音先生《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2期；赵昌平先生《开元十五年前后》一文，刊《中国文化》2期，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6月。